

“辞家豪气今何有”

——韦君宜(1939—1949)研究

布莉莉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 210046)

[摘要]以韦君宜奔赴延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39—1949)创作的小说、日记、旧体诗、杂文等史料为研究对象,在互文对读中建构丰富的“泛文本”意义场,全面综合地把握韦君宜早期由救亡青年到受到“抢救运动”规训,继而转向中共文艺机关干部的曲折心路,不仅能弥补对韦君宜早期研究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理解以其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

[关键词]韦君宜;整风运动;革命心路;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5-0080-13

“Where has all the literati’s valor gone?”

——A Study of Wei Junyi (1939 – 1949)

BU Lili

(Research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aking historical records of Wei Junyi’s novels, diaries, traditional poems and essays as the objects of the research, which were created between the time when Wei was running to Yan’a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39 – 1949), this paper aims to obtain an overall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Wei Junyi’s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from a youthful participant of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to an obedient follower of Yan’an Rescue Movement, and finally to a CPC cadr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gencies as well as her tortuous mental cours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pan-text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textual reading, which may promote the researches on Wei Junyi and help to comprehend the tenacious spiritual quest of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her.

Key words: Wei Junyi,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s,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intellectuals

韦君宜(1917—2002)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其一生始终与民族解放、国家、阶级革命等宏大话语相互纠缠,其革命家、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使她不得不服膺共产党的话语规范,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其旧有的艺术个性、情感结构、思维模式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是个性话语和阶级革命话语不断发生抵牾和对抗。这些艰难繁复的体验,皆在其文本中留下了生动的轨迹:从受到左翼文学鼓舞

参加革命,到满怀乌托邦理想奔赴延安;从自觉接受“毛话语”秩序,到遭受“抢救运动”产生信念动摇;从解放初期个性的昙花一现,到之后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从“文革”时期的彻底“无我”,到晚年“痛定思痛”的大彻大悟……韦君宜在个体与集体的角力撕扯中挣扎摇荡,她的散文、诗词和小说真实地记录下这种灵魂搏斗的痕迹。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韦君宜的研究颇不充分,

主要集中在其晚年对于共产党史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如刘卫东《论韦君宜晚年的思想——以〈思痛录〉和〈露沙的路〉为中心》、李建军《其言直,不隐恶:论韦君宜的晚年写作》、牧惠《韦君宜和她的〈思痛录〉》、阎纲《知识分子的悲剧——读韦君宜〈露沙的路〉记》等等,此外邢小群、孙珉主编的《回应韦君宜》一书,对各类报刊上发表过的评价韦君宜和《思痛录》的文章做了选择性收录,此不一一列举。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多聚焦于《露沙的路》和《思痛录》两部文本,对其早期的创作缺乏足够观照。截止到2015年6月,笔者只检索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宋彬玉《记青少年时期的韦君宜》^[1],另一篇是张欣驰《韦君宜:在清华园的峥嵘岁月》^[2],这两篇文章多侧重记述,缺乏学理剖析。其实,1939—1949这十年对把握韦君宜的革命心路至关重要,她是如何由一个满怀乌托邦理想的革命青年成功转为“毛话语”的积极实践者的?其间又有哪些痛楚与挣扎?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虽然《露沙的路》以一位革命亲历者的见闻与感受,对延安时期的生存状态做了细致回顾,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是作者晚年预设认知视角下的回忆和创作,与当时的具体心境存在一定距离。那么1940年代的韦君宜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呢?经过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其自由意志是否完全被权威话语收编?二者是否存在裂隙?这些都是笔者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以1939—1949年韦君宜的日记、诗词、杂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互文对读中建构丰富的“泛文本”意义场,全面综合地把握韦君宜早期的革命心路,这不仅对于推进韦君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理解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

《别天津登舟》

斩断柔情剩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
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
如此山河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
愿将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3]146}

韦君宜曾说:“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4]286}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某种程度上已经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内在的情感结构,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又强化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使得知识分

子在战时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建立理想化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在这种理想感召下,知识青年们走出家庭、走出学校,“痛苦走天涯,慷慨赴时变”。1937年8月20日,生长于生活优渥之家的韦君宜怀着先验的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毅然决然走出家门,走出清华,步入了革命的洪流。她“不但鲜衣美食不要,功名富贵不要,而且连学术成就也不要,身家性命也不要了!”^{[5]238-239}立志要做暴风雨里的雨燕,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然而,革命工作并非如想象中平坦顺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都是麻烦的事。所有对革命抱着浪漫蒂克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6]2012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上刊载的《韦君宜1938年日记(节选)》,真实地记录了韦君宜流亡时期的心境。当时,出路问题、恋爱问题(1937年底,韦君宜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她先后被派往襄阳和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宜昌,和她接关系的是中共宜昌地区工委书记孙世实,他是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的儿子,清华大学十一级经济系的学生,韦君宜在革命工作中慢慢和他恋爱了)、工作问题纠缠在一起,既有对革命现状停滞不前的焦躁,又有对个人自由与革命伟业的炙热向往,加之外祖父、父母力劝自己去美国留学,韦君宜陷入到“理想与现实、自我和民族、进步和传统、阳刚的革命精神与阴柔的感伤主义的两难困境中”^[7],心境十分焦虑、迷茫。韦君宜对救亡队伍中迟缓滞钝的工作作风十分不满,不甘于卑躬屈节做上层妇女工作、奔走于无见识无眼光的贵妇小姐之间,对用“决议”统治青年学生的地下党工作人员也颇有微词。昂扬的革命理想在残酷的现实屡屡碰壁,每当此时,韦君宜便产生悔意,想念清华、家园:

我至渐有悔不当初之意了。人对我若此,我做这牺牲究竟为了什么?我弃我千金小姐的生涯、弃我学府、弃我无限的前程,倏而就此,我抛高楼大厦珍馐绮罗,呼奴使婢的生活,弃如敝屣,我为得什么?……我舍甘就苦,冀有作为,而今若此,我呆了吗?二年的救亡夺去了我的哲学兴趣和学习努力,一年的流浪更根本把我治学的心都消灭了,如此东奔西跑,一业无成,我不知道已变成何样人物了,自己想想也悲观的很——我已经怀疑我选择的这条

路是否正确的了——方向是不会错的,但是,我是否就最适合采取这样一条路去达到那方向呢?——只想今日再悔,悔已无及,至少几载的光阴已成虚度!清华那良好的读书环境,进修机会亦不存在了。^[8](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后文出现的着重号皆为笔者添加,不一一注明)

面对混乱残酷的革命现实,韦君宜也曾产生“回朕车以复路”的念想,但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仍感召她继续前行。在韦君宜心中,“共产主义”是绝对真理,是目的地,是个体为之献身的祭坛,但是抵达的道路或可商榷。其实,正是这种对彼岸理想的执念,使得韦君宜每当开始对现实有所怀疑和审视,便在“乌托邦”理想的巨大凝视下畏葸不前。在超验的“彼岸”感召下,个人的犹疑和思考是微不足道的;在“未来”美好的允诺中,现下的苦难也是可以忍受的。仔细剖析《韦君宜1938年日记(节选)》,从中可以听到两种话语的不断交锋:既有对腐败现状的明确反抗,又有青春期的浪漫和感伤,在“应该”“使命”“理性”下面其实隐藏着种种冲突和裂缝。韦君宜一方面满怀信心参与着全新理想秩序的建设,另一方面又频频回首、怀念旧日生活;一方面用“理性”告诫自己不可沉溺爱情,“我爱小孙,但我更爱自由,爱我的前途和事业……我实在不能竟为了恋爱而把前途牺牲。”^[8]但另一方面又忍受不住“肉”的诱惑,“现在我真空寂透了,受不了。而同时这弟弟不也是年轻、热烈而可爱的吗?让他的嘴唇印到我脸上,没什么玷辱我。”^[8]韦君宜此一时期的日记,清晰地折射出一个细腻、敏感、脆弱、清高、激进、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而这些个人化印记在日益秩序化的革命体系中是注定要被驯化和整合的。

二

1939年1月2日,韦君宜从成都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刚进延安不久,韦君宜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胡乔木的建议下,到《中国青年》(延安版)做编辑工作。韦君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不少杂文:如《陕北农村一勺》《哪个村子工作好?》《“手工业”与“机械工业”》《悼纪毓秀》《壮丁队化到童子军化》《新娜拉们走后怎样》等。在这些文章中,韦君宜秉持自由、怀疑、批判的精神,以知识分子观察世界的慧眼,审视解放区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哪个村子工作好?》中,她尖锐地批评了青年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揭露了“拿小组会当做衡量工作的标尺,小组会开的多就是工作

好,开得少就是工作坏”^{[3]282}的不良现象,指出不能“为巩固组织而巩固组织”,“为开小组会而开小组会”,要结合实际,踏踏实实工作。《“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一文则批判了工作中存在的冒进、虚夸、不尊重事实的不良风气。很多青年组织工作者为了实现“不让一个青年站在组织门外”的目标,直接向村所调出户口册子,把青年的年龄等抄一遍,或者采用“下通知”的办法,到青年家里去告诉他:“你是我们的会员了!”^{[3]284}韦君宜对这种粗放的“机械工业”的工作方式十分警惕,提出要尊重中国客观发展的不平衡性,反对平均主义的作风,要慢慢解决问题,不能过“左”。

对启蒙立场的坚持、对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精神及批判功能的认同,使韦君宜看到了光明背后存在的种种“病症”。在杂文《壮丁队化到童子军化》中,韦君宜建设性地提议青年半武装组织“不应仅成为服勤务支公差用的壮丁,亦不应仅成为专门打仗的不脱离生产的兵士。它一方面要支持抗战,另一方面应成为培养新一代中国主人的教育机关。”^{[3]292}然而,解放区的“青年”是什么样子的呢?韦君宜敏锐地观察到农村青年中存在的迟钝呆滞、未老先衰的现象:“农村青年仍与他们的上一代毫无不同,简直就没有青年时代!大多数的农村青年还是手捧烟袋,脚空空出一寸多的匣子般的鞋,走路踢踢拖拖,蹲在炕头谈谈家务事,一点不像青年!”^{[3]293}“青年”在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时尚的革命名词,意味着未来、希望、进取和革新的力量。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以“少年中国”对抗“老大帝国”,即是此意。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也强调“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9]“五四”时期更是“子辈”的时代,“逆子们”揭竿而起,向陈腐、老旧的社会传统发起攻击,“叛逆的绝叫”响彻文坛。韦君宜深受“五四”思潮影响,她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主张青年们学习与上一代不同的新生活方式:“我们要将来的每个中国人民都具有普通的政治常识,懂得管理自己的事情,都有健康的人生观,都有普通的军事常识,都会看报看书,都懂得清洁卫生,不再一生洗三次澡,身体都健康,会游泳,会跑路,会爬山,都晓得‘敬业乐群’;把几千年闭关自守的恶习一齐打破。必须如此才能建立现代化国家。”^{[3]292}可见,韦君宜倡导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其中包含了民族国家意识、进步的科学知识、身体的清洁以及种族的健康等。韦君宜的杂文敏锐地揭示出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解放区,历史之轮并未转动,根据地大众很多仍是老

中国封建、麻木、愚昧的群像,她以知识分子敏锐的眼光审视周围一切,表现出强烈的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意识,这种“独异个人/庸众”的关系建构,延续的仍是“五四”时期的典型意象。

1940年3月1日,韦君宜在《中国青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新娜拉们走后怎样》,以女性同情的视点,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对离开家庭走向革命阵营的新娜拉们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耐心的剖析,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问题,婚姻、孩子与事业的矛盾,怎样处理与旧家庭的关系,男女的不平等,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等等。韦君宜敏锐地察觉到:“许多男子把女子在婚前看作朋友,婚后便看作‘自己的老婆’。许多亲朋、戚友、邻舍、街坊,都无言的监视你,责备你,要你做个好好的‘老婆’。管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3]298}新娜拉们随时面临重回家庭的危险,于是有些人便掩盖起自己温柔精细的女性肉身,戴上了中性的面具,为人处事像男人一样豪爽开阔,生活和工作中时时以男人的标准要求,变成了一个“假男子”。韦君宜以敏锐的慧眼拆穿了这种性别伪装,认为此举会对女性形成新的压迫,甚至会导致女性自身的彻底解构,“因为这样求平等的人自己先就认为女人一切都是坏的,男人一切都是好的。自己先已经看不起女子了,怎能希望别人看得起?又怎能希望真和男子平等呢?这种求平等的方法实在是错误的。”^{[3]302}女性以男性为标杆,不敢正视自己的性别,其实是女性潜意识中对自身性别的自卑与回避。但是,让这些对未来怀揣憧憬与事业野心的中国新娜拉们安于自己的女性从属角色,生儿育女,操劳家务,做贤妻良母吗?显然不能,新娜拉们只能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精神和体力承受着双重负担。韦君宜非常清楚女性的特殊境遇,生育上无可回避的性别痛苦以及孩子生下后衣衫屎尿件件躬亲的麻烦,都会对事业和进步造成影响。很多女性因为害怕落伍于时代,于是千方百计寻求节育的办法,有些怀孕的女性,急于去掉包袱,害怕被孩子拖累,甚至会不顾生命危险,想尽一切办法刮宫、打胎,以致《解放日报》上甚至发出“救救母亲”^[10]的呼声。然而,不结婚、不生育又违反自然,遭人非议。要解决露沙们的二难处境,韦君宜悲哀地认识到:“只有调和折衷的办法,并无彻底办法,但这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你是中国的女青年,你不能不看见这一点!这痛苦可以减少,但不能根本取消!非负担它不可。”^{[3]299}

在《新娜拉们走后怎样》中,韦君宜以知识女性

的敏锐穿透了解放区“男女平等”的假象,写出了“新娜拉”在革命阵营内部遭遇的种种问题。但饶有意味的是,韦君宜的女性视点受到了国家意志的“收编”,并没有彻底贯彻下去。韦君宜在文本中采取了双重视点:以女性视点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国家视点提出疗救的对策。她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规劝迷茫、痛苦的“新娜拉们”:

惟有民族与社会得到解放时,妇女才能真正解放。^{[3]303}

适当的办法是正视现实,承认有这现实。在这个前提下再想法解决和改进。可以结婚,结婚后可以尽量少做‘主妇’的业务。在目前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尽量避免有孩子。万一有了,也只好在孩子身上尽量少用些心思和力气。雇人,寄养,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不要了,送别人。^{[3]299}

这种用宏大话语超越个人悲欢的写作姿态,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感,阻碍了韦君宜对女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虽然她以知识女性的敏锐看到了解放区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却将独立的思维交给了党及遥远的未来。韦君宜在文中采取了一种“暧昧的写作立场”,试图用超越的集体话语弥合二者扞格的实相,劝诫女性忍受现下残酷的现实。通过上述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韦君宜作为一名抗战知识分子,其启蒙立场是如何一步步被国家意志收编的。

三

如果仔细考察韦君宜的创作历程,其实不难发现,其对主流话语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主动认同”到“被迫改造”的过程,纵观《龙》《群众》《三个朋友》等文本,可以清晰地觉察出这一演变轨迹。1941年7月8日,韦君宜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专栏发表短篇小说《龙——晋西北的民间传说》,这篇小说是韦君宜的成名作,曾和丁玲、孙犁等名家代表作一起,被收入了由周扬编选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解放后还被编入了初中语文课本。晋西北老老村连年大旱,人们想尽办法向龙王求雨而不得,正当灰心绝望时,一位老童生说,可派一名童男去东方朝拜“真龙”,让真龙的爪子在他头上摸一下,村里就可以下雨了。村里派了虎儿向东方朝拜,结果碰到了贺龙和八路军,他们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从那以后老老村就没有了荒年……这篇小说文笔轻盈且具有强烈的民族形式和象征色彩,从侧面赞扬了共产党军队的神威与亲民,正如孟伟哉评价的那样:“人们在落后的生产力

和封建迷信的禁锢下,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观念中的神灵,而真正能解除人民苦难的,并非乌有的神灵,乃是八路军和共产党。”^[11]在《龙》这篇小说里,韦君宜用象征与抒情两种方式实现了自己对于共产党的美好想象与歌颂。值得一提的是,韦君宜笔法高妙,将民间传说与政治话语衔接得天衣无缝,非常契合解放区大众的语言设定、想象逻辑和审美心理模式。这些创作一方面是由于时代话语的感召(当时解放区正提倡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向主流方针靠近、寻求依附感的体现。

1942年5月,毛泽东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建制的核心纲领,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聚集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统一的话语口径,被有效地纳入到革命政权文化动员的整体组织结构当中。为了响应整风,韦君宜1942年8月2日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群众》,描写了热情浪漫的知识分子初次接触下层民众时的尴尬遭遇。从城市奔赴根据地的三个女青年,在下乡做群众工作时,对“群众”怀有类乎革命小说中的浪漫想象:“最使她兴奋的还是她没见过的广大群众和为群众献身的伟大工作。她咬着小指头默默地凝想,就仿佛亲眼看见那黑压压的大海似的一片人头,冒着热气。还有火点子似的千千万万红缨枪在黑压压的人海上乱闪。”^{[5]203}然而,想象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当概念的抽象性要求还原为生活的实际形态时,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产生了矛盾。三个女孩子被派到老乡家里住宿,屋主人因房子里有新打的粮食一直不肯离去,双方因住宿问题发生了争执。第二天,三个女孩子兴匆匆去向部长要求任务,希望展开群众工作,殊不知自己昨天与之发生摩擦的老乡即是“群众”。最后,在部长的训示教诲下,女孩们认识到原来“群众”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他们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结尾是:“三个女孩子默默地,把头一直埋到了胸前。这是整顿三风中一个知识分子的一段反省笔记。”^{[5]207}

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群众”这一概念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结构之中,成为与“国家”“民族”“阶级”“革命”等概念并驾齐驱的、蕴含巨大政治能量的能指,与之相反,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则被逐步取消,只有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时,才作为“他者”现身。《群众》这篇小说具有某种话语仪式的功能,知识分子在群众面前的“反省”和“忏悔”,其实内含着某种权力结构。

米歇尔·福柯曾指出:“忏悔是一种话语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说话的主体同时又是陈述主体;它同时又是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的仪式,因为不当着合作者的面,谁也不会去坦白忏悔。这位合作者不光是一个对话者,而且是一个权威,他需要你坦白,规定你坦白,并对你的坦白予以评价,不断介入以进行裁判、惩罚、宽恕、安慰与调解。”^[12]在这种话语的忏悔仪式中,“反省者”是被动的陈述主体,“听话者”是位居高位的权威听者,后者对于前者具有支配性的统治力量。《群众》作为一个“检讨的文本”,显在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凌空蹈虚、不切合工作实际的政治幼稚病,指出知识分子要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改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脱胎换骨。经由这一“忏悔仪式”,解放区的知识分子逐步走向了模糊自己个性特征的大众化之路,在向“工农群众”低头认同的过程中,“个体/旧我”被埋葬,“新我”则被纳入到主流话语当中,知识分子的多样性被折成了单向度,逐步走向了同一。

如果说《群众》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幼稚病,那么《三个朋友》则为知识分子的具体改造指明了出路。小说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描写了“我”在农村参加土改时所熟知的三位朋友:一个是知识分子,即在城里做经济工作的罗平;一个农民朋友,即“我”的房东刘金宽;还有一个是绅士黄四爷。下乡后,“我”努力与农民打成一片,但是知识分子丰富的精神需求仍折磨着我,“挖土担粪我全不怕,只要咬牙就能成。只有一点终归骗不了自己,心里总好像有一块不能侵犯的小小空隙,一放开工作,一丢下锄头,那空隙就慢慢扩大起来,变成一股真正的寂寞。”^{[5]193}“我”开始留恋过去的生活,怀念淡蓝色墙壁的电影院,向往“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与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朋友走得很亲密。但是,在淳朴厚道的农民朋友刘金宽的感召下,“我”渐渐剥掉了“寂寞”“梦幻”和对往昔的依恋,回归到了“红太阳绿麦田的世界”:

我从后面看他,他站在铺满阳光的山坡上,土地在他的脚底下一片片开花,高大的背影衬在碧青的空间,格外显明。好像一根大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这一比,比得我多小啊!^{[5]196}

在这里,“农民”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时也获得了道德和美学上的合法性,成为屹立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大写的“人”,而知识分子高蹈的启蒙姿态则彻底隐遁,只得匍匐于工农脚下,“放下臭

架子,甘当小学生”,这种自我贬低和抬高工农,显然更多来自解放区意识形态的渗入。后来,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也不再惧怕虚伪阴险的绅士朋友黄四爷,勇敢地参与到减租减息运动中去,知道了自己的脚该站在什么地方,也意识到了只有刘金宽才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和农民朋友在一起真是“胜读十年书”。阿尔都塞称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实践,《三个朋友》可谓是自觉践行毛话语意志的文本,小说通过“我”与三个朋友的交往,为知识分子的改造之路指明了方向。经过整风运动,韦君宜已逐步认同毛话语的逻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3],成为了主流话语的宣传者、生产者 and 捍卫者。

四

延安时期的韦君宜身上交织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这使得其文学活动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面向,一方面坚守自由传统、直面现实,另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臣服大众,最后终被集体意志规训(discipline),俯就于强势的政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裂隙,在个体与政治理想和集体话语的博弈中,韦君宜其个体文化人格遭遇了某种程度的分裂(延安“抢救运动”期间,韦君宜精神遭受重创,患美尼尔氏症,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韦君宜的矛盾和痛苦是深层次的、隐在的,其曲折复杂的身份认同过程,正是社会文化规约与知识分子的独立追求之间角力撕扯的结果。

韦君宜在古体散文《八年行脚录》(1945年8月)中,对自己从“流亡”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在解放区的生活作了简单回顾,写出了一个“富家小姐”如何蜕变为“革命战士”的过程,从“余生二十年,不知虱子为何物”到与其成为“随身密友”,从“我亦有邹厨,珍奇尝口厌”到“私生活唯一欲望为‘吃’”^{[2]377},战时物质条件的艰苦锻炼了韦君宜的革命意志,但是与物质的贫乏相比,精神的受挫是更大的打击和毁灭,荒谬的政治运动剥离了“乌托邦”的梦幻外衣,渐渐裸露其残酷、粗粝的本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八年行脚录》中对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竟然未提只字,韦君宜似乎有意将这段痛苦的经历封锁于幽暗的记忆深渊。这或是迫于集体意志的压力“不可说”,或是出于“子为父隐”的“不愿说”,其中的曲折考量,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地看,“抢救运动”对奔赴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来

说,不仅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灭顶之痛,更是对知识分子自五四起形成的启蒙传统的阉割。在运动中,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被组织上疑为特务,押进了整风班。由于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再加上环境困苦、无人照管,韦君宜的第一个女儿不幸夭亡。1943年写下的这首诗清晰地刻画出韦君宜当时悲凉、迷惘的心境: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忖误吾唯文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4]76}

这首七言诗中流淌着一种深刻的悔恨与隐痛,弥漫着身世飘零、灵魂无处寄存的空虚感。在革命乌托邦与残酷现实的猛烈撞击下,韦君宜体味到了革命理论的空洞,对自己曾经笃信的革命信仰产生了怀疑,陷入了“于无地彷徨”的困境。共产主义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原先是一种何其圣洁的理想,后来却成为一种不得不服从的森严的秩序,这不能不令满怀自由、民主理想的韦君宜感到困惑、迷茫。下面这首《家》,是写于“抢救运动”之后的白话诗,后来在编辑《思痛录》时,韦君宜坚持不肯将此诗收录,因为诗中有太多“离经叛道”之语,直接宣泄出被怀疑的委屈和对党之不察的怨恨:

八年来/对人说/这儿是我们的家/可是/如今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家啊!/你对我们/就是这般模样!/究竟谁是手足!/谁是仇人?/谁是亲人/谁是奸臣?/光明的世界里/却搅在一团糊打混/我们如今成了外人/有辱骂/有冷眼/有绳索/有监狱…/看那些冷眼/世上人有什么肝胆?/八年只算个飞腾的梦/梦醒来/高原的老北风/吹得热身子冰冷/把心撕碎放在牙缝里咬/看还知道痛不知道!/不该哭/本该狂笑/但我刚甩开笑纹/眼泪就顺它流下来了/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3]213-218}

徐贲说:“参加革命的人既反叛自然家庭的黏合关系,却又在同时向往一种与家庭关系类似的关系,结果加入到一种替代自然家庭的类家庭关系中去。”^[14]韦君宜对革命怀着一种类乎宗教信仰的特殊情感,有一种强烈的“家”的意识。在《思痛录》中,她曾坦言:“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我觉得到了延安便

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枪来继续战斗。”^[4]¹⁶⁸通过“游子/母亲、家”这一比喻修辞的转换,使“革命”获得了一种内化的、亲切的、情感上的归属力量。“家”是我们肉身和梦想的庇护所,是群体界限鲜明的社会单位,对于传统意义上家庭观念浓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如此。“家”是母性的摇篮,没有了家,人便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累累若丧家之犬”。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内”与“外”的几何学,显示的其实是“是”与“非”的辩证法,逐出家门即意味着内外有别,非我族类,这是极其严厉的精神惩罚。然而,在家中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到怀疑、审查、关押,承受莫须有的罪名,这对革命满怀真诚信仰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痛。

经过“抢救运动”之后,韦君宜很大程度上被集体权威“规训”了,写下了如《群众》《三个朋友》那样的迎合主流意志的文本。然而这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仍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显现出来。1947年11月20日左右,离家近十年的韦君宜乔装打扮,返抵北平:“说句老实话,我这次回北平虽然只是请假来治疗,虽然属于我自己的家还在老解放区(我丈夫还在土改工作团等着我回去呢),可是心里真有点倦游归来的味儿。这么多年真跑累了。——可不能把当年在老解放区参加革命的人都美化成高大全呀,说实话当时我真想看看我亲爱的城市、亲爱的家乡,想歇一会儿,哪怕只歇一小会儿!我疲倦了。”^[5]⁵¹²⁻⁵¹³古体散文《还乡记》对此做了细致描写,其中有一首诗词值得细细玩味:

塞下十年,山城万里,到今喜见平芜。弥望无涯,眸豁径接天隅。连阡似画棋盘格,列千畦绿卷秋蔬。未枯黄,如屏碧树,浅草长芦。封城回首分携夜,把慢词默诵,小柿擎朱。归路非遥,云烟隐隐吾庐。辞家豪气今何有,暗唏嘘只剩今吾。堪慰者,尚健高堂,正倚门间。^[2]³⁸⁵

以“风景”暗喻“故国”之思,在古代文学已经有之,如《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有研究者称“风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它提供一种方法,使某些阶层的人通过想象与自然的关系表示自己及其所处的世界,并强调和传达自己与他人相对于外部自然的社会角色。”^[15]风景是一种主观的构成,它们主动印刻着特定意识形态观念和矛盾情绪,从“山城”到“平芜”,不仅意味着地形的转换,同时也暗喻着心境的急缓。在这首诗中,明丽悦目的色彩、和谐的田园风光、云烟中隐现的房屋、父母高堂这些带有

原始抚慰性符码的出现,暗示着客居他乡的韦君宜对精神归属的深度渴求。

1948年,韦君宜和丈夫杨述在河北省平山县参加筹备《中国青年》复刊的工作,《中国青年》是团机关刊物,肩负着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和引导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办刊宗旨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和建设的洪流,帮助青年解决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难题。”^[16]1949年3月,《中国青年》迁到北京,从复刊后的第4期起正式在北京出版,韦君宜当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总编辑,作为党的机关工作干部,韦君宜的思想受到集体话语的拘囿,已开始慢慢僵化。

参考文献:

- [1] 韦君宜.韦君宜纪念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0-93.
- [2] 张欣驰.韦君宜:在清华园的峥嵘岁月[J].中国出版,2011(3):69.
- [3] 韦君宜.韦君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4] 韦君宜.韦君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5] 韦君宜.韦君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6]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82.
- [7] 刘剑梅.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动[J].郭冰茹,译.当代作家评论,2007(5):137.
- [8] 韦君宜.韦君宜1938年日记(节选)[J].新文学史料,2012(4):145.
- [9] 陈独秀.社告[J].青年杂志,1915(1):1.
- [10] 曾克.救救母亲,解放日报[N].1942-03-08.
- [11] 孟伟哉.从浪漫走向现实:读韦君宜小说有感[J].文学评论,1983(6):37.
- [12] 米歇尔·福柯.性史[M].姬旭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53-54.
-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
- [14] 徐贵.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106.
- [15] W. J. T. 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70.
- [16] 许明.续写青春历程:访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石国雄[J].中国出版,1994(10):36-37.